

论我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的战略转变

——兼论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意义

徐鹏航 汪定国

如果说，十年前，中华大地掀起的改革浪潮，把我国经济从封闭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产品经济体制下解放出来，转到开放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上来，是我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第一个战略转变的话，那么，十年后的今天，举国上下正广泛深入开展的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学习武钢走质量效益型道路，把经济发展从主要靠规模的扩大、速度的增加，转到效益的提高上来，则是我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的第二个战略转变。实现这个转变，既是国民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生动体现，也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现实要求和必然结果。研究这个转变，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同时，更富重大意义、更具深远影响的还在于，以雄辩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和美好前景，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从而，使我们更加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第一个战略转变的实现，确立了基本的原则，指明了前进方向，因而，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就。众所周知，三中全会以前的三十年，我国经济一直是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企业，处在行政主管部门附属物的地位，缺乏

生产经营自主权；国家同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上，实行的是统收统支；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诸要素，靠指令性计划，实行统分统配，对产品统购包销。长期以来，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使企业乃至国民经济缺乏生机与活力，严重地影响到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得到体现和反映。改变这种状况，已是刻不容缓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举改革旗帜，为结束这种旧体制发出了动员令。特别是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更加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把改革——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伟大历史潮流引向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这第一个转变的实现至少反映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统得过多过死，开始向适应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方面转变；二是经济发展由封闭的产品经济，向开放式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重大转变（当然不能说这种转变已经完成）。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产生的深远影响已经为我国人民和世界所瞩目，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将进一步明显和突出。从运行机制上的变化看，由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开始向全民所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转变；企业由附属物开始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

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的方向转变；国家同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上，由统收统支转到企业留利、利改税、承包制、租赁制形式，以及正在试点的税利分流等形式；国家对企业的管理由直接管理为主开始向间接管理为主的方向转变，等等。

运行机制变化，其本质是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必然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新发展。1953——1978年的26年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6%，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2.2%。改革开放方针实行以来的1978——1988年的十年间，上述三个方面的增幅分别为9.1%、5.9%和7.6%。外贸出口十年增长4.4倍。1980——1990年的十年间，湖北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3倍；工业总产值增长2.27倍，年增长率为12.6%；农业总产值增长88.1%，年均增长6.5%；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79%，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68倍。应该说，改革开放的十年，是我国经济实力增强最多的十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十年。究其原因，固然方面颇多，但是可以断定，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当数经济运行机制的初步转换、指导思想上的第一个战略转变的初步实现。

二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到第八个五年计划，人类历史发展的脚步迈进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顺乎时势的需要，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第二个战略转变。就是要把经济发展由注重规模增加和速度增长，切实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即把经济发展的数量增加为主，转到以提高质量为主

的轨道上来；把以追求高速度为目标的外延型增长模式，转换成以追求高效益为目标的内涵型增长模式。这次转变，与第一次转变相比，难度更大，同时，其内涵也更加丰富，带来的影响和产生的效应将会更加深刻。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极其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起步的。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国民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在令每个中国人倍感骄傲和自豪。从清朝末年办“洋务”到1949年的半个多世纪，全国工业只积累起100多亿元的工业固定资产；198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固定资产达到10641亿元，增长了85倍之多。全国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由1952年的每人每年76元，提高到了1988年的639元。四十年来，我国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和国防建设，都取得了迅速发展和显著加强。中华民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已经并且还将继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充分肯定4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的同时，认真回顾总结经验教训，对今后事业的健康发展会是大有裨益的。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往往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江总书记的这个论断，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存在着重速度、轻效益，重数量、轻质量的偏向，使经济建设难以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这势必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造成巨大损失。应当看到，在我国目前劳动生产率水平不高、科技含量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主要是靠材料、资金和廉价劳动力的高投入换取的。据有关资料介绍，1984——1988

年全国国民收入增长70%，而固定资产增长214%；1979—1989年我国货币发行总计达2132亿元，为1949—1978年30年间货币发行212亿元的10倍，平均增长24.5%，远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物耗、能耗水平也在逐年增高。1978—1987年间，我国工业生产物耗率平均增长3.4%，生产领域的物耗与国民收入比，1978年为1:0.785，1984年为1:0.752，1989年则为1:0.651。我国单位产值和能耗也很高。据统计，每生产一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我国消耗的能源等于法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英国的2.97倍。还有，工资成本增长过快。1978—1989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5.1%，而同期国民收入平均增长9.2%，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10.9%。1989年全国工资总额又比上年增长14%，国民收入仅增长3.7%。这说明，以工资形式支出的货币额的增长超过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出现了超分配。有人把这种靠货币超发行搞建设，靠国民收入超分配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作法，比作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这样，不仅高速度难以维系下去，还会给整个经济带来严重破坏，通货膨胀、滞胀等恶性循环便会相继发生。回顾“六五”、“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曾经几次出现的膨胀——压缩——再膨胀——再压缩调整的现象，就是急于求成，重速度、轻效益思想的体现和反映。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这一社会经济现象，我们不难发现，以追求速度为目标的外延增长型的发展模式的产生和延续，有其现实的社会要求、客观条件的可能性和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建国初期，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是一贫如洗的破烂摊子，的确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因此，铺开摊子、大搞建设，加快发展速度，既是奠定国民经济的基础、构建国民经济体系的必需，更是满足人

民基本物质文化生活、巩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政权的迫切要求。经济生活如同其他客观事物一样，质和量是辩证统一体。没有一定的量的存在，质亦无从谈起。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这种发展模式产生与发展的经济哲学原理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什么这种主要依靠资金、物质资料过高投入的模式能够维持这么长一段时间呢？其可能性何在呢？我们以为，主要是建设初期发展规模不算大，我国的资源相对充实所致。平心而论，在建国初期乃至稍后一个时期，这种发展对迅速建立我国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较快形成国家的经济实力，打破国际敌对势力的政治颠覆和经济封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经济政治意义不应低估。

必须看到，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第二个转变，推动经济发展模式战略转换，同样是社会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这主要体现在：同目前的国力和人们现实购买力水平相比，我国的经济规模已经不算小了，特别是工业经济规模可以说是相当可观的。但是，长期以来，产品品种单一、质量档次水平不高、企业经济效益不理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近一年多来出现的市场疲软、企业产品积压严重、三项资金占压居高不下的顽疾，是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这些，迫使我们不得不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发产品、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上来。还有，随着发展规模的迅速扩大，各种物质投入的急剧增加，使得能源、原材料供应普遍吃紧，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还不能满足要求，资金可供量严重不足，整个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绷得很紧。这些供求矛盾，在最近10年，特别是“七五”期间表现得日益尖锐和突出，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经济生活中的这些现象无情地告诉我们：现有的生产条件无法支

撑住这样快的速度和这么大规模：“八五”乃至今后的经济发展再不能沿着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老路走下去了。现实又一次迫使人们把注意力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加强企业管理上来，把主要依靠物力、财力的投入，逐步转到主要依靠智力的投入上来，真正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走出一条投入少、产出多、质量好、消耗低、效益高的新路子。应该说，这就是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学习武钢走质量效益型的道路经验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

如何实现这个转变？我们认为，就目前情况看，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事实证明，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又一次转换，必须首先在思想观念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当前，观念转变要体现在下述几点：一是把只注重社会需要，忽视现实可能性的急于求成的思想，转到把需要与可能相结合、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上来。40年来的实践告诉人们，凡是离开现实基础的大干快上，往往是欲速不达，反而把速度拉得比正常水平还要慢的道路上。既要吃饭，也要建设；有多少钱，办多大的事。这应是“量力而行”原则的朴素解释。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但这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二是要克服经济发展过程的大起大落，遵循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坚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能主动地、自觉地调节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减少因单纯市场机制盲目调节给社会资源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浪费。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因缺少经验，曾有过因计划统得过死，影响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充分发

挥的旧体制的制约，使经济发展不快；也有过因宏观调控没有相应跟上，造成一段时期经济过热、明显通货膨胀的状况。记取经济发展的这些历史轨迹，有助于我们时刻警惕：经济工作中必须始终把握住社会总供给同总需求的大体平衡的这个原则，认真抓好生产、流通和消费诸环节的衔接和平衡，力求金融、财政、物资和外汇的基本平衡，以及处理好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相互关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科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三是把单纯追求发展、盲目扩大规模的思想，真正转移到以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李鹏总理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今后十年要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切实抓出成效来。效益中心的观点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但始终未能真正落实。现在是要真正落实的时候了。要使大家真正懂得，没有效益的速度，是一种浪费；不把工作的重点转到以效益为中心上来，是经济工作的重大失误。

第二，要建立起适应模式转换需要的运行机制。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单有行政性的倡导动员、号召还远为不够，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机制，使新的模式建立起之后能灵活运转，并能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总的目标是，这种机制能激励提高效益的各项活动的顺利推进；反之，能制约单纯追求速度、忽视效益的各项活动。具体说来，需要建立以下几个机制：一是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的导向机制。这里包括产业的行业政策和地区的区域布局政策。为保证宏观效益的实现，国家在充分考虑局部利益和效益的同时，制订具体政策，引导微观经济行为沿着国家政策方向发展。背离政策目标的，应该受到制约。二是投资导向机制。对有益于效益充分发挥的建设项目，在资金上重点扶持，利率上给予优惠，税率上给予照

顾。反之,则采取经济的、行政的等手段加以控制。三是市场竞争机制。要充分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运用兼并、控股甚至倒闭等办法,把那些长期经营性亏损又无法扭亏的企业逐步淘汰,不保护落后。四是运用行政手段的调节机制。对干部政绩的考核,不能单以产值高低论英雄,而应以该地区或行业、企业整体素质提高作为标准;承包制中单纯包速度的办法,要改进为速度、效益的综合指标体系,等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机制,但是这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第三,要把科技进步作为质量效益型或内涵增长型模式的基石,落实到今后经济发展工作中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说到底,是要把科技进步引入到经济建设的各个环节中,有效地发挥其特有的促进作用。江泽民总书记说:“如果说,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保证了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实现,那么,我们把经济建设进一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必将保证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同时将为第二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充分说明,科技进步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的重要地位和促进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历史意义。科技长入经济,经济依靠科技,必须有一个相互结合的机制,就是对能自觉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对从多方面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大幅度提高了经济效益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大力奖励和支持;反之,则应给予限制,甚至逐步淘汰,以提高工业经济的整体素质。要充分发挥国家最近批准建立的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示范试验作用,尽快形成一批科技含量高、附加价值大、规模效益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把大批高新技术成果应用于传统产业改造中去,焕发存量的活力,让科学技术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坐前排”、“唱主角”。

第四,要在加强企业管理上下功夫、花气力。管理出效益,这是很有道理的。要使经济发展从主要靠量的扩张转到质的提高上来,归根结底,是要使作为经济细胞的企业的管理科学化、现代化。就是要严格按照产品生产的客观规律的要求,把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科学地组织起来,达到投入少、产出多、消耗低、效益高的目的。目前,影响企业效益提高的制约因素有内外两个方面,但居主要地位的应是企业内部管理水平不高所致。因此,我们要动真格,从抓好基础管理入手,搞好标准、计量、定额等基础工作;同时,要把现场管理这个薄弱环节促上去,使产品加工的全过程始终处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从而保证产品质量。此外,还要继续抓好全面质量管理和现代化管理,推进企业管理上档升级,全面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第五,要继续深化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各项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同质量效益型的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经营管理体制。无论是机制的建立,还是管理的加强,都有赖于改革的不断深化。具体说来,首先就是要使企业,特别是大中型骨干企业充满生机与活力,使其逐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从而使他们具有提高自身素质、加强企业管理、依靠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和要求。其次,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以及物资、资金市场等,为企业能够生产出大量价廉、物美、效益高的产品提供必需的市场环境。此外,还要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能力,把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社会经济生活稳步、协调地向前发展。

(责任编辑 徐云鹏)